



淄博市第三批援藏技术干部刘树亮往来信件

“西藏，我不会忘记”

《昂仁岁月》记录淄博援藏干部的无悔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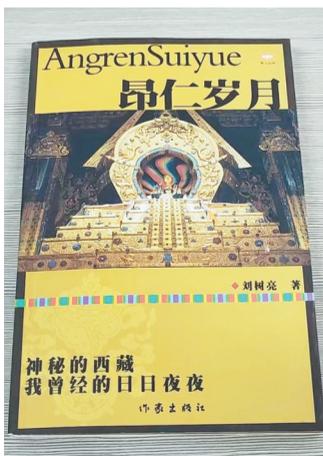
在《昂仁岁月》一书里，记录了刘树亮等淄博援藏干部在昂仁期间的工作和生活。



1998年5月至2001年5月，淄博市第二批援藏干部和这期间第三、四、五批援藏技术干部，在平均海拔4513米的雪域高原经受了高原气候的考验，扎根昂仁，奉献昂仁，得到昂仁干部群众的爱戴。

日前，淄博市第三批援藏技术干部刘树亮将他的援藏工作回忆录《昂仁岁月》及照片、书信等资料捐赠给了淄博市档案馆。这本真实反映当时淄博市对口援建昂仁的回忆录，记录着他1998年7月31日初到西藏时的心情：“终于来到了梦幻般的青藏高原，我的双脚马上就要踏上西藏的土地了，我的心激动着，随着簇拥的人流向前移动着，每移动一步就感到离梦想靠近一步。”

怀揣支援西藏、发展昂仁的赤子之心，淄博市第二批援藏干部在3年援藏期间，先后帮助日喀则市昂仁县挺过了百年不遇的泥石流和洪灾及严重的雪灾，完成了37项援助项目，争取到了西藏自治区计委立项的3600多万元的投资，达到了县域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还多的目标……这些成就都印证着他们“生命有禁区，奉献无止境”的无悔誓言。



刘树亮所著的《昂仁岁月》

“西藏，我不会忘记”

“李娜演唱的《青藏高原》和李琼演唱的《吉祥的彩云》，这两首歌高亢嘹亮，悠远飘逸，我每次听到它，都会有对那段雪域生活故地重游的感觉。这么多年，我虽然身在家乡故里，但心却永远留在了那片高原之上。”回忆起当年援藏的经历，淄博援藏技术干部刘树亮无限感慨。

在西藏，刘树亮不会忘记的是那一通“比生孩子还难”的电话。

在刘树亮的记忆中，西藏与内地通电话，有两大难：其一是拨出难，由于西藏与内地没有电缆线的连接，援藏干部想与内地通话只能依靠无线通讯卫星，受信号等多种因素影响，与家里人或是好友通上一次电话，要试拨十几次甚至几十次，并且接通后还经常会有突然挂断的情况发生；其二是通话难，4500米的海拔，对于援藏干部来说，说话是不能快的，时间也是不能长的，否则就会气喘急促，上气不接下气，间或头疼头晕，浑身乏力，所以一次通话只能持续几分钟。

“我们在昂仁，没有特殊情况，一般是不与家里或者同事打电话的。打电话就是一种负担，甚至是一种痛苦，就像在内地参加万米赛跑一样，完成一次这样的‘艰巨任务’，既要有很大的勇气，又要有相当的耐力。”刘树亮说，那时援藏干部中流传着这样一种打趣的说法：打个电话，比生孩子还难！

在高原，一般的感冒都会变得非常危险，那次让刘树亮瘫倒在床起不来的感冒，他至今不能忘怀。“在淄博感冒，只是感觉浑身无力不想动弹。”刘树亮说，进藏后他得了感冒，加上高原反应，刘树亮不仅浑身无力，甚至整个身体都像散了架，并且还伴着头疼脑涨、腹痛等。当地医疗条件有限，他只能遵从医嘱，在每天饭后吃些感冒胶囊、西羚解毒

片和“PPA”。

困难重重之下，回忆也更加深刻。刘树亮在他的援藏工作回忆录《昂仁岁月》中写道：“西藏特定的环境馈赠和生活阅历使我终生受用，尤其是苦其心志、饿其肌肤、劳其筋骨的高原气候的磨炼，是我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雪山草原、河流冰川、雄鹰经幡以及藏族老阿爸老阿妈慈祥的面庞，在我心中汨汨流淌……”

援藏是一场漫长的考试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考试，在不同的阶段考着不同的内容。三年援藏是一场事业心、责任心、党性原则、意志、品质、人格的考试，我很庆幸自己通过了。”淄博市第二批援藏干部、时任昂仁县城建局局长周军回忆道。

如周军所说，援藏是一场有关意志的考试。

“从进藏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头晕目眩，剧烈头痛，心率每分钟120次以上，血压在130/170mmHg，耳鸣心慌，胸闷气短，四肢无力，厌食腹胀，双目发青浮肿，嘴唇发紫，彻夜难眠，每天都要吸氧气、吃降压镇痛药……一个月下来，我体重下降了十公斤。”周军告诉记者，从淄博到位于祖国西部腹地的青藏高原，陡然攀升的不仅仅是4000多米的海拔，还有援藏干部的心跳与血压。

1999年7月，淄博市委组织部组织7名援藏干部的家属和孩子进藏探亲，进藏第一天，周军的儿子也患上了高原性感冒，高烧不退，只能住院治疗。彼时，周军因劳累过度患肺部感染，正在住院。一家三口在高原的“首次见面”，竟然是在医院。娘俩见周军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子，胳膊上打着吊瓶，止不住泪流满面。

“对不起，让你受累了。”“什么也别说了，安心把病治好。你干起工作来什么都不顾，要爱惜身体呀！”

夫妻俩的几句对话，一时深情流露，让在场的医生也流下了眼泪。

援藏也是一场有关责任的考试。

“住着马车店，吃着方便面，盯、靠、贴得上，争来项目资金3000万。”这是当年援藏工作中广为流传的佳话，说的正是周军一行人。1998年7月至9月三个月，西藏经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暴雨袭击，219、318国道沿线泥石流成灾，山体滑坡塌方严重，整个国道线多处被毁、被堵，周军一行人就冒着山石随时滚落的危险外出跑项目。

“最危险的一次是像圆桌那么大的几块石头相继滚落在我们车前车后不足5米和3米远的地方，差点就车毁人亡。”周军说。

为了省时间、赶进度、争项目，周军一行人超负荷运作，天天晚上加班加点，时常通宵达旦，开夜车走夜路是常有的事情，遇到洪水与落石也是家常便饭。据周军回忆，他们最长被堵过11个小时，11个小时内每人只吃了一个苹果，忍受着饥饿、干渴、太阳灼烤的痛苦……即便这样，他们还是肩扛援藏重任坚持了下来。

“生命有禁区，奉献无止境”

从1998年到达昂仁县，直到2001年离开，淄博市第二批援藏干部始终以孔繁森为榜样，恪守“有志而来，有为而归”的信念，脚踏实地、扎实工作，用实际行动促进了民族团结融合，增进了友谊。

昂仁县共17个乡镇191个村，海拔在5000米以上、空气含氧量仅为50%的乡镇就占了一半，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370公里，援藏干部们到偏远乡镇下乡，一去就是一两个星期，临出发前，他们会自己烙上饼，卷上铺盖，吃住在农牧民土坯筑的简陋房子或帐篷里。有一次他们吃了村民18个鸡蛋，事后他们按一个鸡蛋一块钱给村民付了钱。

第二批援藏干部每次下乡，身上都会特意带上钱，每次都会分文不剩捐给当地困难户，援藏3年，第二批援藏干部个人捐助的款额就有4万元。

2001年，淄博市第二批援藏干部在返回淄博前的最后几天，还去了秋窝乡看望乡里的贫困户。在一个贫困户家，一位将花白辫子盘在头上的老大娘，从援藏干部一进她的家门口，就紧紧牵起了一位干部的手，始终不肯松开，当听说他们是来告别时，老大娘泪水涟涟地冲他们磕了3个头。错愕间，他们赶忙将老大娘扶起来。大娘以自己的方式向第二批援藏干部表达自己最崇高的敬意。

“淄博派来的干部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永远忘不了。”很多藏族同胞在援藏干部们即将启程回淄时，都对他们恋恋不舍。因为援藏干部的一言一行，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三年时间，淄博市第二批援藏干部全力实施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建设，争取到自治区计委立项的总投资3600多万元的十几项工程。昂仁县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9749.47万元，比1997年增长了79.51%，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177.13元，比1997年增长67.62%。另外，昂仁还收到了来自淄博的无偿支援资金和物资，总值达1161万元。

农牧民收入得到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改善，县域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还要多。“生命有禁区，奉献无止境”，淄博市第二批援藏干部为雪域高原带来了美好的新希望。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孙良栋 见习记者 黄文姣 通讯员 耿瑶



扫描“鲁中晨报”APP二维码查看现场视频